

雷蒙德·拉蒙特·布朗 著

宪兵

——日本可怕的军事警察

西方人眼中的日本宪兵
魔鬼队伍的写真读本

4348
L

宪 兵

——日本可怕的军事警察

[英] 雷蒙德·拉蒙－布朗 著

蓝文萱 陈建民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utton Publishing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Kempeitai**.

Copyright © Raymond Lamont - Brown 1998

The Author asserts the moral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宪兵：日本可怕的军事警察/(英)布朗著；蓝文萱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1

(20世纪历史揭秘丛书)

ISBN 7-5012-1067-5

I . 宪… II . ①布… ②蓝… III . 警察 - 活动 - 日本 - 1937~1945
IV . D7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0442 号

责任编辑/王立 任红岩

封面设计/段来和

责任出版/车胜春

责任校对/天天

出版发行/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电话/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010)65265928

邮政编码/100005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万秋电子有限公司排版

印 刷/保定市西城胶印厂

开本印张/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字 数/100 千字

插 页/2

版次印数/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 册

书 号/ISBN 7-5012-1067-5/K·259

定 价/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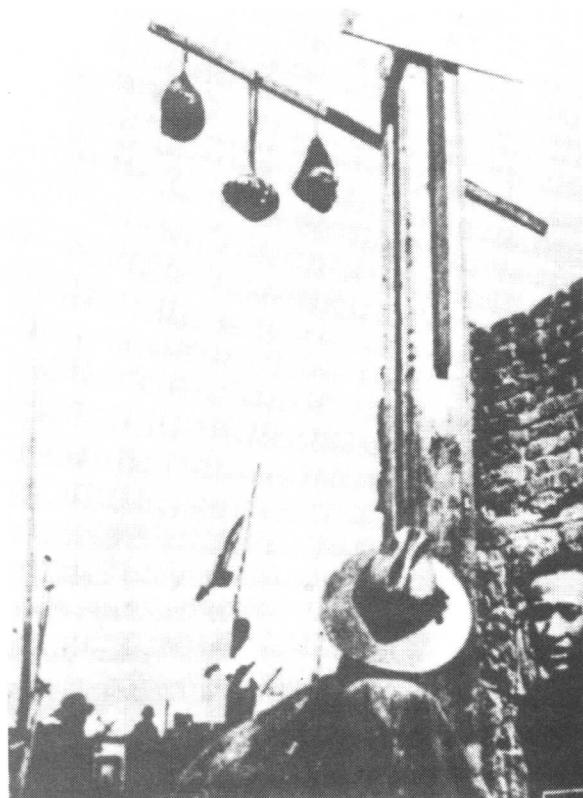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被称为“宪兵之父”的东条英机。

L/AB310d

成百上千的无辜中国人被宪兵杀害。图为被害者的头颅在一个中国小镇上示众。



放下了武器、仍佩戴着臂章的日本宪兵，在一名宪兵军官的带领下前往拘留所。



1945年7月，日本宪兵在缅甸毛淡棉的格拉贡村实施了一起大屠杀。图为日本投降后，被关押在毛淡棉拘留所的日本宪兵列队接受一个幸存者的指认。



日本投降后，裕仁天皇骑马检阅他的军队，宪兵就是在他的名义下犯下了种种暴行。



前日本宪兵人员和帝国陆军士兵穿着旧军服参拜位于东京九段的靖国神舍。

目 录

前 言	初遇日本宪兵	1
第一章	日本宪兵的起源	13
第二章	日本宪兵的征召、部署和职责	39
第三章	日本宪兵在满洲的残杀	67
第四章	在朝鲜的日本宪兵	93
第五章	间谍网与日本宪兵	99
第六章	日本宪兵对英美飞行员的屠杀	111
第七章	日本宪兵与英国狮	121
第八章	遭遇厄运的军团	133
第九章	宪兵的下场	153

前 言

初遇日本宪兵

我所知的世界现已成了耻辱
之地。

对于将死的我，
美好时光永不再来了。

——引自被绞死的甲级战犯山下奉文
(1885~1946) 大将的诗

西贡的商会……吉隆坡的普杜监狱……新加坡的奥特拉姆大道……这些地方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遇过日本宪兵的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因为这些地方都曾是日本宪兵团总部的驻地，人们在那里经受过难以名状的恐怖，有时仅仅因为是外国人便遭此折磨。我本人通过翻阅先父的日记才第一次接触到了日本宪兵的情况。40年代初期，我父亲在中国东部的上海曾遭到日本宪兵的囚禁。那段遭遇给他造成的心灵创伤不仅从未愈合，而且还缩短了他的寿命。有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遭受过类似的折磨。

那时，到上海的游客大都乘船沿着恶臭的黄浦江水抵达这座城市。《南京条约》签订（1842年）后，上海对外开放贸易，黄浦江被殖民炮舰和外国鸦片商辟为通往国际知名的上海滨江码头地区的航线。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殖民势力在这里建立了商业领地，这是在中国最早建立的商业领地之一。在20和30年代，上海被一些人称为“东方的巴黎”，而被另一些

人称作“东方的娼妓”。

上海是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不少街道取的都是“雷恩公园”、“爱德华七世大街”这样的洋名。从 1843 年起英国人便在这里建起了会员制赛马场，他们常在“上海俱乐部”这样的滨江休闲地聚会。该俱乐部被他们自诩为世界上最长的酒吧。这里也聚集了世界列强的间谍，他们把从这里打听到的小道消息又散布到各自的领事馆。美国人在 1863 年联合英国侨民建立了国际租界，他们往往在“吉米的厨房”这类地方聚会，据说这里可调制出远东地区最好的咖啡。与美国人相邻的是 1849 年建立的法国租界，颇有天主教传道区的气氛。这里有绿树成荫的街道和妓院。先后来到上海这座大熔炉的还有约 2 万名躲避布尔什维主义的白俄和逃避纳粹主义的欧洲犹太人。上海的每个外国人居住区都有各自的军警部队和司法系统，其中尤以日本宪兵队组织最为严密，行为也最为严酷和狂妄。

30 年代，日本政府推行瓜分中国的计划。日本人在满洲的恐怖统治导致反日情绪极为高涨。到 1931 年，中国人都在抵制日货。在上海，反日情绪尤为强烈，因为国际租界区内日本人最多，是最大的外国侨团。1932 年 1 月 21 日，日本总领事要求中国大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将军压制一切反日情绪，惩处在近期的

骚乱中杀死日本公民的凶手。

还没等这位市长作出“温顺”的答复，日本海军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中将便在1月28日发动了进攻。这就是第一次“上海事变”。日军迅速占领了该城的闸北地区，并开始发动空袭。蔡廷锴将军指挥的第19路军与日军展开激战，但最后中国军队还是撤退了。1932年5月，在英国政府和国际联盟的调停下，中日双方签订了颇为勉强的停战协定。日本继续在中国扩张，到1935年，中国北方五省已沦为深受日本影响的地区。实际上，中国已处在寺内寿一大将和植田谦吉大将这两位日军司令官的控制之下，而受他们指挥的就有数以百计的宪兵队员。

不久，日本人开始着手发动“上海战役”。1937年8月，两名日本雇佣兵在上海附近被杀，引发了日本的全面入侵。1937年12月2日，6000名日军士兵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胜利阅兵式，上海这时已沦为被占领的城市。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10月，日本人相继占领了苏州、广州和武汉。1940年3月，日本人在南京成立了以中国国民党的背叛者汪精卫为首的傀儡政府。这期间，国际租界区内的生活依旧，生意照做，合同照签。我父亲仍在为巴布科克与威尔科克斯有限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工作，该公司是伦布里的一家锅炉

制造商，由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合伙经营。

日本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对美国和英国宣战后，日本宪兵队和日军部队征用了上海的一切资产，并在全上海建起了带刺的铁丝网路障。宪兵队在滨江码头地区设立了司令部，里面有臭名昭著的桥屋监狱。当时我父亲正寄居在宫殿旅馆。他在日记中描述了 1942 年 3 月 5 日被日本宪兵逮捕的经过：

今天凌晨 4 点（日本宪兵惯于在东京时间凌晨 3 点抓人），我的身体剧烈摇晃起来，我被 5 名穿便衣的日本宪兵粗暴地弄醒了，其中 4 个挥舞着左轮手枪，那架势与土匪没什么两样。第 5 个宪兵军官扛着一挺轻机枪，他命令我起床穿上衣服。这时，另外 4 名宪兵正在仔细搜查我的所有行李。等他们搜查完时，我发现我的两个箱子里已被他们装满了（反日）报刊和某些书籍。接着我便被逼着拿起箱子随他们登上一辆等候着的汽车。显然，日本宪兵是有备而来的，因为这五个荷枪实弹的人一路上都不离我左右。我十分小心谨慎，生怕有什么闪失，因为我已完全意识到了稍有不慎必定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汽车在一座大楼前停了下来，我认出这就是上海令人畏惧的“地狱

“魔窟”，它的正式名称叫桥屋监狱。他们把我粗暴地推下车，将我押到楼上的一间屋子，那里已关押了一批不同国籍的人，他们也都是被日本宪兵设下圈套抓进来的。

大约两个小时后，日本宪兵命令我掏空衣袋，摘下衣领、领带、背带和（短袜）吊袜带。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突然间竟遭到罪犯般的待遇。在他们押着我急匆匆穿过监狱的院子时，我竭力想从一个宪兵口中得到解释。我只听到一声可怕的咆哮，便被推进了一间木制牢房，门也被关上了。

一进牢房，难闻的气味就扑面而来。我发现这种令我作呕的气味是从放在角落里的一只没有遮盖的马桶里散发出的，牢房里不同国籍的男女老幼都用这一只马桶。

现在的问题便是设法使自己适应这种没有鞋子可暖脚，也没有背带可系裤子的生活了……

[1942年3月6日]

躺在没有毛毯的水泥地板上熬过一个不眠之夜后，第二天早晨，我和另外三人被从这间牢房转送到另一间牢房。这里是监狱的旧牢区，条件甚至更差。这间牢房约有9.4英尺长，20英尺宽，

屋里弥漫着同样难闻的气味。牢房里混住着中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和英国人。我被关押在此期间，这间牢房里一度曾囚禁了 42 个人，睡觉的时候，不少人都得坐着睡才行。我们的睡眠还经常因押来新犯人或是有人被提审而受到严重妨碍。

桥屋监狱也和所有日本宪兵队的监狱一样，审讯工作一直不停地进行。每时每刻，在某些地方，都有人因受到严刑拷打、伤口得不到治疗或是极度恐怖而痛苦得尖声嘶叫。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父亲想方设法驱除对这里的恐怖感。他不断地演算数学问题，回忆与朋友们的谈话，记述他在苏格兰鲍德尔郡的童年生活。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人们渐渐地变得丧失了人性，被囚禁的只是动物般的躯体了。我父亲继续写道：

……牢房里有那么多中国人在遭受可怕的疾病的折磨（实际上，一些人的肌体正在腐烂，散发着恶臭），（这）使得情形变得更加恐怖了。令人揪心的是，这些疾病有可能通过害虫传染给我们。我觉得自己极为幸运，没有染上任何疾病，而相当多的白人就没我这么走运了。事实上，与我关在一间牢房里的一位著名记者就失去了双脚。

给我们吃的食品只有大米粥，那种味道直叫人作呕。直到我被提审后，食物也没有任何变化。24天后他们才允许我洗漱和刮脸，他们甚至不让我换衣服。他们对我的指控是从事非法间谍和宣传活动……

经过残酷的审讯，日本宪兵一无所获，我父亲被释放了。他和其他英国公民被押上“镰仓丸”号邮船和“奈良田”号轮船遣送回国。

那些致力于综合研究日本二战史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日本宪兵活动情况的历史学家，早就发现了妨碍日本人获得成功的两大民族特性，即“战术上的近视”和“战略上的健忘症”。几十年间，日本外务省对“南京大屠杀”这类事件一直采取遮遮掩掩的态度。在1937年12月13日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发动的这次大屠杀中，有30万中国人遭屠杀和受重伤致残，使得一切企图树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良好形象的人深感沮丧。只是自90年代以来，日本文部省才允许新教科书采用不同观点详细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尽管日本的神社和寺庙公开陈列死难的日本宪兵军官的纪念物，可当有人问起这些“英灵”的经历时，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这些人是国家的一大

荣誉”之类的陈词滥调。日本民族的健忘这时便暴露无遗了。

本书试图首次用英语详细探讨日本宪兵的全部历史、其组织体制和行为方式，贯穿其中的都是一幕幕惨痛的情景。为什么日本宪兵会蓄意干出如此残忍的事？为什么他们会如此漠视人类的苦难？探讨其中的确切原因对西方读者或许是有益的，因为日本宪兵的所作所为无论如何都不能宽恕。从日本的社会结构、其过去的军事法规及其对人性的观念中都能发现有关的线索。

战争史上，虐待俘虏一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随着日本在 19 世纪摆脱了封建束缚，其种族歧视（亦即认同所有国家都不如神国日本优越的观点）的倾向日益强烈。到 1910 年吞并朝鲜前后，弥漫整个日本的新军事思潮便认为外国人低人一等。从中日甲午战争（1894 年～1895 年）时起，日本就要求其士兵宁可自杀也不投降。这种观念被称为“玉碎”，它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从空中和海上发动自杀式的“神风”攻击。后面这种被当作战略（不同于一时冲动的行为）加以运用的行为准则，也是投降的盟军部队和人员遭到日本人蔑视的原因之一——他们在敌人面前丢了脸。此外，《帝国陆军军事训练条令》也促进了日本古代军